

明清 史料考论

展龙 著

海外借



科学出版社

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资助项目成果
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

明清 史料考论

展龙著

科学出版社
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运用寓论于考，考论结合的研究方法，对焦竑《献征录》、薛应旂《宪章录》、张廷玉《明史》、万斯同《明史》、吴炎等《明史记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明清要籍之编撰缘起、成书刊布、撰述义例、文献征稽、史学价值及衍脱舛讹做了细致考究，其中既有微观的文献考证，也有宏观的义理阐述。全书凡分七题，成此一编，旨在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以为学界同好充分征用《明史》《献征录》《宪章录》等重要文献扫清史误，澄清史实，厘清史源，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明清史料史实提供文献基础和理论参考。

本书适合对明清史、史学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史料考论 / 展龙著. —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2017.12
ISBN 978-7-03-056231-9

I. ①明… II. ①展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史料-明清时代 IV. ①K248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3876 号

责任编辑: 耿 雪 / 责任校对: 张林红
责任印制: 张 伟 / 封面设计: 耕者设计

科学出版社 出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17

<http://www.sciencep.com>

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

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17 年 12 月 第 一 版 开本: 720×1000 B5

2017 年 12 月 第一次印刷 印张: 24 1/4

字数: 360 000

定价: 99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焦竑《献征录》研究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《献征录》编纂流传 | 4 |
| (一) 编纂动因 | 4 |
| (二) 编纂过程 | 10 |
| (三) 版本流传 | 15 |
| 二、《献征录》编纂义例 | 18 |
| (一) 编载人物, 系以官署 | 19 |
| (二) 收录人物, 德行为先 | 24 |
| (三) 传记类型, 灵活多样 | 31 |
| 三、《献征录》文献征引 | 32 |
| (一) 文献征引范围 | 33 |
| (二) 文献征引方法 | 40 |
| (三) 文献征引原则 | 42 |
| 四、《献征录》史料价值 | 45 |
| (一) 补明史文献之阙 | 46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（二）为明史文献之源····· | 47 |
| （三）订明史文献之讹····· | 48 |
| （四）辑明史文献之佚····· | 49 |
| （五）《献征录》纰漏····· | 50 |

薛应旂《宪章录》编纂义例及特色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编纂体例灵活恰当····· | 61 |
| 二、善于臧否本朝人物····· | 63 |
| 三、详载官方文献编修····· | 64 |
| 四、广泛精当的“按语”····· | 66 |
| 五、史料来源翔实可靠····· | 67 |
| （一）征引历朝实录····· | 67 |
| （二）博采野史笔记····· | 71 |
| （三）取材见闻史料····· | 73 |

万斯同《明史》序、论的史学价值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论明代典制之得失····· | 77 |
| 二、论明代历史之兴衰····· | 81 |
| 三、论明代人物之善恶····· | 85 |
| 四、序、论特色与价值····· | 90 |

吴炎、潘怪章《明史记》编纂考论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《明史记》编纂缘起····· | 94 |
| (一) 保存故国之史····· | 94 |
| (二) 批评私修明史····· | 95 |
| (三) 推重《史记》旧例····· | 96 |
| 二、《明史记》编纂过程····· | 96 |
| (一) 编纂体例····· | 96 |
| (二) 撰写分工····· | 98 |
| (三) 史料征集····· | 99 |
| (四) 完稿情况····· | 100 |
| 三、《明史记》史料来源····· | 102 |

“四库”馆臣论明代笔记史料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《总目》著录明人笔记····· | 106 |
| 二、论明人笔记的史料价值····· | 108 |
| 三、论明人笔记的纰漏缺陷····· | 115 |

张廷玉《明史·列传》疑误拾零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人名误····· | 123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、地名误····· | 197 |
| 三、时间误····· | 231 |
| 四、史实误····· | 253 |
| 五、职官误····· | 280 |
| 六、文字误····· | 297 |
| 七、标点误····· | 338 |
| 焦竑著述编年考 ····· | 345 |
| 参考文献 ····· | 367 |

焦竑《献征录》研究

焦竑（1540—1620年），字弱侯，号澹园，江苏江宁（今南京市）人。万历十七年（1589年）进士，官翰林院修撰。焦竑长涉艺文，耽悦史传，居今识古，覃思著述，所撰诸书遍及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又兼涉金石、文字、音韵等领域，他既是“以文学冠时”^①的文学家和“以倡明圣学为己任”^②的哲学家，也是“开清代校勘学先例”^③的文献学家；其所论曾被时人“视为冠冕舟航”^④，“奉为拱璧”^⑤，或得其片言，也“莫不叹以为难得”^⑥，即使对焦竑颇有非议的清人，也认为他“负博物之名”^⑦。不仅如此，在明代史坛上，焦竑堪为名家，他博古通今，谙于国史，撰成《皇明人物考》《国史经籍志》《逊国忠节录》《熙朝名臣实录》《献征录》《玉堂丛语》等当代史著多部。但其中卷帙最博、声誉最隆、最能代表焦竑史学成就的当属《献征录》。^⑧

《献征录》，又称《国朝献征录》《国史献征录》^⑨《国史文献征

①（明）沈德符撰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一六《己丑词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421页。

②（清）陈作霖纂：《（光绪）金陵通传》卷一九《焦竑传》，《中国方志丛书》本，台北：成文出版有限公司，1970年，第553页。

③ 范文澜：《经学史讲演录》，《历史学》1979年第6期。

④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首《尊师澹园焦先生续集序》（徐光启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1219页。

⑤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首《澹园续集序》（金励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1217页。

⑥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首《焦太史澹园集序》（耿定力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1211页。

⑦（清）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八七《国史经籍志》提要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744页。

⑧ 展龙：《明清以来焦竑研究述论》，《历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研究》，北京：方志出版社，2004年。

⑨（清）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五八《今献备遗》提要云：“明人学无根柢，而最好著书，尤好作私史。其以累朝人物汇辑成编者，如雷礼之《列卿记》、杨豫孙之《名臣琬琰录》、焦竑之《国史献征录》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五八《今献备遗》提要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524页）《千顷堂书目》《明史·艺文志》亦著录为《国史献征录》。

录》^①，凡 120 卷，是一部明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。此书所收人物起自明开国初期，包括元末农民起义中的部分人物，如郭子兴、俞廷玉、花云、徐寿辉、张德胜、耿再成等均死于元至正年间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“国朝”人物。故说《献征录》所收人物起于明初或洪武初，皆有失准确。此书所收人物下限，学界观点有三：清四库馆臣云“迄于嘉靖”^②，今人商传^③、陈高华诸先生^④从此说，《献征录》上海书店影印 1986 年“出版说明”也持此观点。此外，德国学者傅吾康（Wolfgang Franke，1912—2007 年）先生云“终万历初期”^⑤。而南炳文先生、李小林先生则认为“下迄万历末”^⑥。实际上，第三种说法更为准确。万历一朝凡四十八年，在明代诸帝中历时最久。据笔者统计，《献征录》所收人物共有 3554 人，其中不少生活在万历末年，如沈子木卒于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 年），王锡爵卒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 年），阮鄂卒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 年），申时行卒于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 年），最晚的是李廷机，卒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 年），仅比焦竑早离世四年。

传记史书，自有渊源。书名以“献”专指传记者，《献征录》之前就有不少，仅明代就有：嘉靖三年（1524 年），郑岳纂成《莆阳文献》，其

① 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 年）四月江苏巡抚杨魁奏缴条，载《清代禁书总述》，北京：中国书店，1999 年，第 187 页。

② （清）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六二《献征录》提要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 年，第 559 页。

③ 商传先生说：“书中收入明建国至嘉靖中各类人物近四千。”白寿彝主编：《中国通史》第 15 册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65 页。

④ 陈高华、陈智超等：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83 年，第 383 页。安作璋、朱仲玉、丁宏宣、王炜民诸先生也有相同说法，分别见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4 年，第 263 页；《焦竑的史学成就》，《历史文献研究》（北京新八辑），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7 年；《论焦竑与〈国史经籍志〉》，《图书馆论坛》1997 年第 1 期；《焦竑的文献学》，《历史文献研究》（北京新五辑），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4 年。另，《简明中国古籍辞典》（长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7 年）、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）在释《献征录》时，亦云“至嘉靖”。

⑤ [美] 牟复礼、[英] 崔瑞德编：《剑桥中国明代史》，张书生、黄沫、杨品良，等译，思炜、张言、谢亮生校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2 年，第 812 页。

⑥ 南炳文：《正直博学的焦澹园》，《明史研究》第 4 辑，1994 年；李小林：《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》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49 页。

中属“文”者13卷，属“献”者75卷^①，黄起龙序云：“取名公事迹为列传74卷。”此“名公事迹”即为“献”。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，李濂《祥符文献志》17卷成书，是书所载人物，自明初至嘉靖，共29人。嘉靖末，袁褰《皇明献实》40卷，收录人物自开国迄嘉靖初，共180人。以此书为基础，万历初，项笃寿成《今献备遗》42卷，书中收洪武至正德“公卿将相，烈士才人，崇勋懋德，纯懿孤棱，称首八朝者”^②，凡204人。《藩献志》4卷，则主要记载宗室王侯的事迹。以上各“献”，皆指人物传记。而书名中首次出现“献征录”者，《献征录》之前有朱存理的《吴郡献征录》^③。可见，焦竑将此书题曰《献征录》，与这种风气不无关系^④，且明人黄汝亨已经明示：“（《献征录》）自同姓诸侯王传、文臣武臣以及四夷等传，凡百二十余卷，万有一千余页，录名《献征》。”^⑤《献征录》之后，尚有以“献”标题的传记史书，如清人曹溶《续献征录》、李桓《国朝耆献类征初编》、刘毓松《彭城献征录》等。

焦竑《献征录》被誉为明代“最杰出的”传记之一^⑥，所收明代人物时间跨度之大，数量之多，可谓史无前例。不仅如此，书中博采群籍，且多为原始资料或唯一资料，从而保证了全书史料的丰富性和真实性，主要

- ① 此书卷数史载各异。《千顷堂书目》七《地理类》云：“郑岳《莆阳文献志》七十五卷，弘治中修。注：吴（騫）校云：‘《遗书目》云诗文杂著十三卷，列传七十四篇’。疑所谓七十五卷者，误也。”（见黄虞稷撰：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七《地理类中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191页）《明史》卷九七《艺文·二地理类》：“郑岳《莆阳文献志》七十五卷。”（见《明史》卷九七《艺文二·地理类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2413页）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六一《传记存目三》：“《莆阳文献》十三卷、《列传》七十五卷。”（清·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六一《莆阳文献》提要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550页）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·史部传记类》：“《莆阳文献》一三卷，《列传》七十五卷。”（王重民撰：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34页）实际上，言七十五卷者，是包括了原书作者郑岳一传，其他并无出入。
- ② （明）项笃寿撰：《今献备遗》卷首《今献备遗原序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，第453册，第504页。
- ③ 据《国朝献征录》卷一一五《朱性南存理墓志铭》（文征明撰）云：“（朱存理）纂集有《经子钩玄》《吴郡献征录》《名物寓言》等。”（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第531册，第512页），今佚。
- ④ 此前焦竑已有“收录国献”一说：“（此书）至收录文献。明习典故者，当奉为耆蔡，未可与虚车之词同类而共观之也。”（明·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续集》卷一《梁端肃公奏议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761页）。
- ⑤ （明）焦竑辑：《献征录》卷首《献征录序》（黄汝亨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第525册，第7页。
- ⑥ （美）牟复礼、（英）崔瑞德编：《剑桥中国明代史》，张书生、黄沫、杨品良，等译，思炜、张言、谢亮生校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812页。

表现在：一是部分人物传记他书无，而此书有；二是部分人物传记他书简略，而此书详备；三是部分人物传记他书讹误，而此书精当。可以说，研究明史，此书必不可少。然而，明清鼎革之际，清朝统治者因人废言，他们在批评焦竑附会佛禅、近于“异端”之时，也对《献征录》颇有非议，或云“卷帙最为浩博，而冗杂泛滥，不免有所抵牾”^①，或云“文颇泛滥，不皆可据”^②，甚至认为此书“语有违碍”^③而大加禁毁。但纵然如此，明清之际仍有许多有识之士不顾专制淫威，“感明史而痛之”^④，满怀“国可亡史不可亡”的故国情怀，致力于明史编撰，其间他们曾广引《献征录》。近年来，明史研究蔚然勃兴，学术界在整理明史文献，探究明代史实时，也多引《献征录》，创获颇多，以致赢得“钩深致远，穷志极研，使读者兴会淋漓”^⑤的学术美誉。但一直以来，学界虽然承认《献征录》“煌煌巨编足当明代传记之冠”^⑥，并自觉加以征引，却在忽视焦竑研究之时，也忽略了对《献征录》的探究。有鉴于此，兹通过考证求源、比较归纳、逻辑阐释、计量分析、钩沉辑佚等研究方法，拟就《献征录》的编纂过程、编纂义例、主要内容、史学价值及其文献征引的范围、方法等予以考究。

一、《献征录》编纂流传

（一）编纂动因

史家著史既源自学术志趣的驱动，也与其所处时代休戚相关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司马光修《资治通鉴》，无论是为了“使乱臣贼子惧”，还是要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抑或“鉴前世之兴衰，考

①（清）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《今献备遗》提要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524页。

②（清）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六二《献征录》提要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559页。

③ 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《湖广总督三宝等呈查缴应毁各书清单》，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969页。

④（明）谈迁著，张宗祥校点：《国榷》卷首《自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5页。

⑤ 白钢：《中国政治制度史》卷首序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。

⑥ 1986年10月上海书店影印《献征录》“出版说明”。

当今之得失”，无疑都具有真实、客观的时代因素。同样，焦竑编纂《献征录》也有着深层的学术缘起和历史背景。

1. 社会现实的驱动

明后期以降，面对政权渐衰、世风日下的社会局面，许多史学家流露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经世观念，表现在学术行为上，就是相继撰述了一系列经世著作，诸如陈建的《皇明通纪》、雷礼的《皇明大政记》和《国朝列卿记》、彭韶的《国朝名臣录赞》、徐纮的《明名臣琬琰录》、徐咸的《皇明名臣言行录》、薛应旂的《宪章录》，郑晓的《吾学编》等，无不蕴含“经世务，裨圣化”^①“与经世者共之”^②的经世愿望。同样，基于对现实社会的真切体认，焦竑忧心忡忡、感慨万分：

余立朝几十年，会时事莽莽，日怀忧虑。窃见同事无与共忧者，意愈皇皇，若不能朝夕。相知者谓余无责守，何必乃尔？然余方窃禄于朝，万分不能解，归来严栖采蕨，兴味萧然，乃若驰于负担者；但谓乐其身治，则深有愧焉。^③

这种深沉的忧国之情体现在学术思想上，便是经世观念的泛起，他不仅批判“喜为空谈，而不求诸实践”^④的空疏学风，更提出“学不知经世，非学也”^⑤等主题鲜明的经世观点。可以说，焦竑编纂《献征录》一定程度上成了其践履经世观念的重要途径。他曾分析天下忧患说：

今两都警备，费已不貲，然倭固不至，至亦无益于用也。民贫财殫，不自爱惜，一旦有急，何以待之？顷风波生于朝堂，干戈系于唇吻，家聘其私，人思为政，仆以谓可忧者不在夷虜耳。自惟疏直寡

①（明）郑晓撰：《吾学编》卷首《序略》（郑履准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第424册，第134页。

②（明）薛应旂撰：《宪章录》卷首《宪章录序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本，史部第11册，第376页。

③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焦氏笔乘续集》卷四《文子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87页。

④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续集》卷二《神交馆集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790页。

⑤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一四《荆川先生右编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141页。

谐，隐忧徒切，思卷而怀之，未知所出也。^①

又说：

西陲幸即荡平，倭患尚不可测，然此非所急也。国是摇摇，人心不美，此国之大患，顾不知收拾挽回之，当自何处着手耳。^②

在焦竑看来，当时“国之大患”并非“夷虏”“倭患”，而是内忧。他认为造成“国是摇摇”，纪纲败坏，军政废弛的根源，在于朝廷所用非人、朋党力争、“民贫财”和“人心不美”。由此，他继承宋元以来注重正君心、正臣心、正民心的史学经世路线，以期通过《献征录》对本朝人物事迹的翔实记述，宣扬“忠君”“仁义”等价值观念，进而凭借一系列个体生命来树立政治和道德的人伦典范，以改变“世间公道多坏”^③的局面，最终达到警世、昭世和醒世的目的。

当然，焦竑的史学旨趣也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点。作为泰州学派的一员，在其“心学”观点中，同样包含有关“人性”的论说。他认为“性本无物，空空洞洞；而且性无善无恶，浑浑融融”^④，而之所以出现善恶之别，取决于后天的人生履历和生命感悟。所以他提出“复性”^⑤的观点，认为已经恶化的人性可以通过教化、修养和学习得以恢复，进而完成内心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，实现“通生死，外祸福，成天下之务”^⑥的终极目的。与此相联系，焦竑认为编纂《献征录》也应对“修身蓄德”^⑦、改变人性和复归良知有着积极意义。在此，他将“人性”的理论阐释与修史的经世意义联系起来，从而使其编纂《献征录》的动机多了几分哲学

①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一三《答陈兵宪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112页。

②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一三《答乔给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103页。

③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焦氏笔乘》卷四《刘文介公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132页。

④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一三《答许中丞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113页。

⑤ 复性，即复归人的良知之性。焦竑云：“余谓学非他，以还其良心之谓也。”（明·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续集》卷四《天目书院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832页）又云：“夫学必有宗，如射之有的也。的若何？吾之初心是也。”（明·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一四《宗儒语略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130页）

⑥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一四《京学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133页。

⑦（明）焦竑撰：《熙朝名臣实录》卷首《熙朝名臣实录叙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第532册，第2页。

色彩。

此外，焦竑编纂《献征录》也与明代后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。“历史事实根源于人类的存在。集中在个人日常生活上的微观探索是历史赖以建立的坚强基础。”^①但在专制社会，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和记载却较为有限。明代中期以后，随着专制统治的日渐松弛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启蒙思潮的日益高涨，在社会生活中，人们对国家和地主的人身依附有所松懈；在文化生活中，政治禁网有所松弛，学术禁区也随之减少。于是，人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逐渐泛起，一些有识之士在针砭时政之时，开始自觉关注个人或群体在专制统治下的境遇，甚至展开了对人生意义的理性思考，宣扬“天生一人，自有一人之用”^②，“何至甘心死人脚下”^③的主体意识。在此背景下，史学界蔚然兴起了撰修当代人物传记的热潮，出现了彭韶的《国朝名臣录赞》、徐纮的《明名臣琬琰录》、徐咸的《皇明名臣言行录》、雷礼的《国朝列卿记》等人物传记。这为焦竑编纂《献征录》营造了浓郁的学术氛围，提供了丰富的传记史料。

2. 不满以实录代国史的局面

传统观念中，只有纪传体史书方可称为“国史”或“正史”，而实录无非“备史”而已。明代历朝不修国史，唯以实录代之。对此，早在焦竑之前，王鏊、郑晓、郎瑛、李建泰、沈德符、王世贞^④等已有微词，认为明代实录“曲笔为多”^⑤，不可尽据。明人之所以对实录持此态度，盖不能因为实录是“正史之本”^⑥，就对其观点概加否定。实际上，明人持批

① [英]巴特菲尔德：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》，《历史》1955年增刊，第4页。

② (明)李贽：《焚书》卷一《答耿中丞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16页。

③ (明)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焦氏笔乘续集》卷二《支谈上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30页。

④ (明)王鏊撰：《震泽长语》卷上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，第867册，第205页；(明)郑晓撰：《今言》卷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；(明)郎瑛撰：《七修类稿》卷一三《三无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136页；(明)何乔远辑：《名山藏》卷首《序》(李建泰)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本，第46册，第127页；(明)沈德符撰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五《私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631页；(明)王世贞撰，魏连科点校：《弇山堂别集》卷二〇《史乘考误一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361页。

⑤ (明)沈德符撰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《实录难据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61页。

⑥ (清)夏燮撰：《明通鉴》卷首《义例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7页。

评态度有其理由：一是实录确有曲笔之处；二是他们对实录持批判态度，并非要否定实录的史料价值，只是对煌煌明代而无“正史”这一事实发出的缺憾，所谓“明兴二百余年，正史未备，后嗣何观？”^①“前朝史与《实录》并行，本朝则不然”^②，无疑是要与前代一样，修成本朝正史而已。^③

同样，焦竑立志编纂《献征录》，除了社会现实的驱动外，也与他不满明代单依实录，而无“正史”的局面有关。在他看来，实录只是“待异日采择”的资料，而“非正史”。^④出乎此，焦竑对实录的悖谬诬妄之处深加剖析。首先，他认为实录对诸帝的记载多难据信，其谓：

累朝《实录》，禀于总裁，苟非其人，是非多谬。如谓方正学（方孝孺）为乞哀，于肃愍为迎立，褒贬出之胸臆，美恶系其爱憎。此类实繁，难以枚举。^⑤

褒贬任情，溢美曲笔是官修史书的通病。在此，焦竑的批判一针见血，毫无隐讳，尤其是“此类实繁，难以枚举”一语，不仅说明了实录纰漏之多，也反映了焦竑对实录的是非真妄有深刻了解。

其次，焦竑对实录三品以上官员方可立传的做法不以为然^⑥，他批驳道：

窃闻旧例，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传。夫史以褒贬人伦。岂论显

①（明）王圻撰：《续文献通考》卷八六《职官考·史官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第763册，第460页。

②（明）朱荃宰撰：《文通》卷二《国史策问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本，集部第418册，第390页。

③ 明代之前，正史与实录并行者唯宋代，当时本朝历史文献除了起居注、日历、实录、会要等外，本朝正史有《三朝国史》《二朝国史》《四朝国史》及《中兴四朝国史》等。

④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二三《经籍志论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306页。

⑤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五《修史条陈四事议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30页。

⑥《明实录》立传不仅以品位为准，也注重人物的功勋、德行和节义，此历朝实录卷首凡例有载，如《明宣宗实录》第十六条云：“若中外文武官有功绩显著，及以事特升迁者，不限职之大小皆书。官大臣之子亦书。”第三十三条云：“若文武官有治行，功绩显著，不限职之大小皆书。”第三十四条云：“文武臣僚有没于王事者皆书，有得褒赠亦书。”第四十五条云：“有特旨罢黜，干系惩罚者，不限职之大小并书。其蒙特恩宥宥亦书。”

晦。若如所闻，高门虽跼、跻亦书，寒族虽夷、歟并诎，何以阐明公道，昭示来兹？谓当贵贱并列，不必以位为断。^①

在他看来，这种以职位和贵贱为标准的立传原则，不仅限制了对本朝某些重要人物事迹的记载，也难以达到“阐明公道，昭示来兹”的修史目的，故他主张“贵贱并列，不必以位为断”，并倡导另修史书，以补实录记载人物缺漏之失。这一客观求实的治史态度，充分表明焦竑是一位提倡实录传信的史学家，有着“国可灭，史不可灭也”^②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当然，焦竑的视点并未停留在对实录的批判上，与诸多明代史家一样，他批判的旨归是要对实录之不足“亟为改正”^③。如在《献征录》成书之前，焦竑纂成《熙朝名臣实录》即是因为：“明代诸帝有《实录》，而诸臣之事不详。因撰此书，自王侯将相及庶人、方外、缙黄、僮仆、妾妓无不备载，人各为传。”^④

不仅如此，焦竑甚至有纂修本朝正史的念头，“自首廷对，领史官，毅然思有以自举其职”^⑤。但凭借个人力量，要修成一部体例完善、内容翔实的本朝正史，并非易事。焦竑之前，陈建、王世贞、郑晓等都曾为撰修本朝正史煞费苦心，但终未如愿。个中原因，陈继儒在评论王世贞时一语道破：“王弇州（王世贞）负两司马之才，若置之天禄石渠，而以伯玉诸子为副，其史必可观，而老为文人以歿”，实为“本朝大恨事也”。^⑥焦竑虽有“太史”之誉，但鉴于前辙，也只好退而求其次，纂成《献征录》，以“储一代之史材”^⑦，一如时人顾起元所言：

此录（《献征录》——笔者注）出，而一代之人材、政事，如指

①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五《修史条陈四事议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30页。

②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五《修史条陈四事议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29页。

③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五《修史条陈四事议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30页。

④（清）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六二《熙朝名臣实录》提要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559页。

⑤（明）焦竑辑：《献征录》卷首《献征录序》（顾起元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第525册，第1页。

⑥（明）陈继儒：《弇州史料叙》，（明）王世贞撰：《弇州史料》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本，第428—429页。

⑦（明）焦竑辑：《献征录》卷首《献征录序》（顾起元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第525册，第4页。

诸掌。览者资之为政鉴，作者资之为史材，如先生自谓者，所裨岂甚微哉！……余诚愿上一日大开金匱石室，征先生典之，绪成正史，垂诸万世。执此以往，先生得无意乎？^①

在此，顾氏肯定了《献征录》的史学价值，也道出了焦竑编纂此书的初衷，“臣职在国史，当备述主上嘉兴臣工，风厉四海者，以诏来世”^②。

可见，焦竑编纂《献征录》不仅有客观因素，也有诸多主观因素。然而，无论是社会现实的驱动，还是焦竑不满以实录代替国史的局面，不过是他编纂《献征录》的动因而已，并不能作为主要因素直接催生《献征录》，也即动因作为内在因素，不过是维系焦竑修史念头的深层缘由，要将这种修史动因转化为现实的修史行为和最终的史学产品，则需要一定客观的修史条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构成焦竑编纂《献征录》整个过程的基本因素，除内在动因外，最主要的是他必须拥有编纂《献征录》的良好环境和丰富资料，而这些在焦竑参修国史期间业已具备。

（二）编纂过程

焦竑编纂《献征录》是在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至二十五年与修国史期间，但作为他关注本朝人物的最终成果，《献征录》的编纂当起自焦竑编纂此书前所做的史学努力，尤其是他对传记史料的搜集和董理，客观上为《献征录》的编纂奠定了史料基础。焦竑对传记史料的裛辑，在其早年即已开始，他曾说道：

余自束发，好觉观国朝名公卿事迹。迨滥竽词林，尤欲综核其行事，以待异日之参考。此为史职，非第如欧阳公所云夸于田夫野老而已者。顾衙门前辈，体势辽阔，虽隔一资，即不肯降颜以相梯接。苦无从咨问，每就简册中求之，凡人品淑慝，注厯之得失，朝廷之论

①（明）焦竑辑：《献征录》卷首《献征录序》（顾起元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第525册，第2—3页。

②（明）焦竑撰，李剑雄点校：《澹园集》卷二二《恭题两朝谕祭文后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276页。